瓮城溯源*

——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

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　究　员）
邵　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6.02.004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城西南40余公里的高家堡镇，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秃尾河支流洞川沟分别从遗址的西南侧和西北侧穿过。遗址位于两河夹角形成的山峁台塬之上，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内城和外城分别构筑宽约2.5米的石墙，气势恢弘，为国内同时期遗址所罕见，城内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的遗址[1]。

2012~2014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全面揭露了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迹[2]。外城东门址位于外城东北部，视阈开阔，位置险要，由内瓮城、外瓮城、南墩台、北墩台、马面、门塾、散水等组成，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图一）。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发现的瓮城、马面、墩台等早期城防设施，其形制规范、设计精巧、建构技术先进，与后世的同类设施形制无异，是探讨我国古代城防设施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本文在系统梳理以往考古发掘所见瓮城的基础上，探讨石峁遗址瓮城的形制、结构及产生的背景，分析其在中国古代城防建筑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城防制度的影响。

一　石峁遗址瓮城的发现与确认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建有内瓮城和外瓮城（图二）。外瓮城是以一道南北向长墙和两道东西向平行短墙为外围周界，与南墩台、北墩台合围形成的城门外的独立空间。外瓮城的平面呈U形，与门道处于同一条中轴线上，将门道基本遮蔽，使得外城东门不直接暴露于外。外瓮城的U形石墙在靠近墩台处的南北两端分别留有缺口，形成进入城门的南侧主通道和北侧辅通道。南北向石墙长约22、宽2.3米，距墩台约12米；两道东西向石墙分别向南墩台和北墩台方向延伸，北端石墙长8.5米，与北墩台未连接，距北墩台地面散水2.7米；南端石墙因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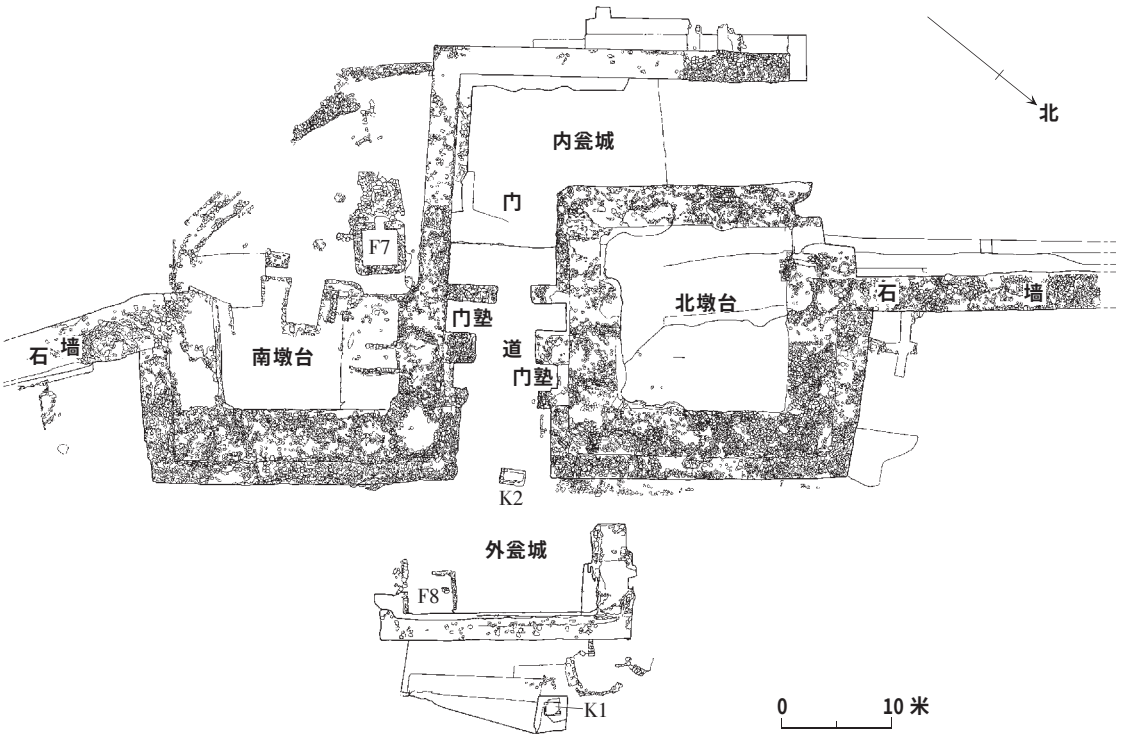
* 本文为“中华文明探源及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子课题“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2013BAK08B05）阶段性成果。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一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由西北向东南摄)

分遭毁坏,残长 4.8 米,与门道之间形成出入空间。在外瓮城石墙的墙体及倒塌堆积中发现玉铲、玉璜等玉器,其中 2 件玉铲出土于北端石墙向北倒塌的墙体内,东西间隔约 2 米,东侧玉铲平置于垒砌的石块错缝之间,石块之间夹杂草拌泥，显然是在墙体建设过程中有意埋入的;在南端石墙的倒塌堆积中发现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在外瓮城南北向石墙的外侧发现一个埋有人头骨的近圆形坑(编号为 K1)。K1 的平面略呈圆形,其内埋有 24 个人头骨,K1 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图三)。

发掘情况表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门道上下两层地面的叠压关系明确,两层地面间隔一层厚约 0.4 米的混杂土层，说明有修建（早



图二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平面图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三　K1内埋人头骨情况

期)和再建(晚期)两大主要使用时期。门道处北墩台石砌护墙内嵌入的圆木及房址2012F6白灰面的碳十四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200~前2040年(实验室编号BA121536)和公元前1940~前1780年(实验室编号BA121534),代表了东门址的修建年代和修葺年代[3]。外瓮城北端石墙南北两侧均叠压有晚期的烧火遗迹和活动硬面,结合外瓮城内侧所见晚期活动面叠压在散乱石块之上的情况考虑,外瓮城的石墙经过两次修补,并在其内侧东南角新建了一座石砌的方形房址(编号为F8),F8的门道向西,朝向城门,其功能类似于门房。因此,目前揭露的外瓮城代表了其晚期形制,而其修建年代与城址和东门址的年代同时。

南墩台和北墩台中间为门道,进入门道后,沿南墩台西侧石墙继续修筑墙体,向西砌

图四　石峁遗址内城门址瓮城鸟瞰图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筑 18 米后北折 32 米，在门道西端内侧形成曲尺形结构，与北墩台西壁围绕形成独立空间，称为内瓮城。内瓮城长约 30、宽约 10 米，石墙墙体宽约 2.5 米，保存最好处高出早期地面 4 米多。这段墙体在门道内侧增修了一道宽约 1.2 米的石墙，两墙紧贴并行。从内瓮城的地层关系看，这道增修的石墙建于晚期地面之上，为二里头早期增修的。在此段石墙墙根底部的晚期地面上发现了 100 余块壁画残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体上。壁画用白灰面作底，用红、黄、黑、橙等色绘几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壁画残块约 30 厘米见方[4]。由此可见，内瓮城的修建年代与城址和东门址的年代同时，在晚期进行过增修，并在内侧墙体上装饰了精美的壁画。

在石峁遗址，除了外城东门址的瓮城外，调查还发现在内城的一处门址也设置了瓮城（图四）。瓮城向城外突出，由长约 25 米的三道石墙合围形成“凸”字形的封闭空间。其中，城门设置于最外侧南北向石墙的中部，门道外约 5 米处修建类似外城东门址的外瓮城。瓮城外设于墙体之外、其外再设遮挡门庭的外瓮城的做法，使得这座城门形成了双外瓮城的结构，这也符合扩大内城防御空间的实际需求。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情况看，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的内瓮城、外瓮城及内城门址的双瓮城，是中国城防史上目前已知最早的瓮城实例，其形态成熟，建筑技术先进，延长了外来势力进入城门的时间，创造了抵御外来入侵的缓冲空间，提高了防御能力。

二　瓮城形成的时间

城门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平时是进出的通道，战时则成为敌军攻击的首要目标。瓮城是围在城门外的小城，多为圆形或方形，其目的是使城门不直接暴露于外，保护城门，阻碍敌军进攻，提高守军的防御能力。瓮城一般与城墙同高，侧向开门，防御者可以从城墙和瓮城两个方向抵御进攻之敌。

瓮城有内瓮城和外瓮城之分，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内瓮城形成的时间要晚于外瓮城，其产生与城门空间范围扩展、形制变化及防御需求突出等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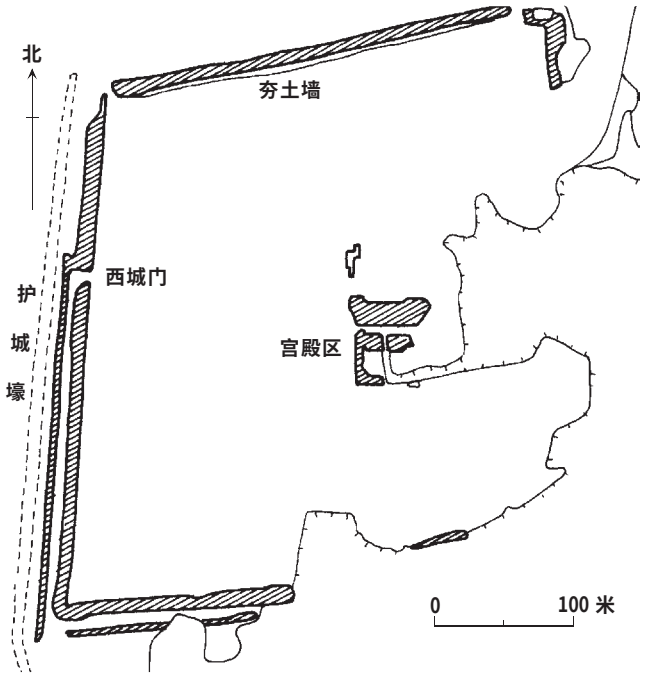
一般认为，在城门之外加筑瓮城始于唐代，至晚在宋代已成为制度[5]。考古发现的唐代瓮城遗迹有扬州城[6]、渤海郡通沟岭山城[7]、高昌故城[8]等。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推进，最早的瓮城考古发掘实例被追溯到了汉代的城障遗址，如考古调查或发掘的甲渠候官坞门[9]、乌力吉高勒城障[10]、八角城[11]等，均在门外复筑坚固的屏墙，迎门遮挡入口，形成狭窄曲折的门径。侯仁之、俞伟超在乌兰布和沙漠调查汉代城址和烽燧遗迹也发现了类似设施，如保尔浩特城址中的曲尺形瓮城、鸡鹿塞废墟[12]的瓮城[13]。

关于瓮城形成的时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始于高句丽时期。高句丽从早期（前 1 世纪末至 4 世纪）至晚期（5 世纪至 7 世纪中叶）普遍地筑建了瓮城[14]，其最早出现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后，与前述汉代边疆地区出现瓮城的时间大致相当。综上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关于瓮城形成的时间多被推定在汉代。考古发现的早期瓮城位于中国北方或西北边疆地区，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表明军事防御的需要是促使其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先秦时期是否有瓮城类设施，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先秦文献中虽没有明确的有关瓮城的记载，但《诗·郑风·出其东门》载“出其闉阇，有女如荼”。毛传：“闉，曲城也。阇，城台也。”孔疏：“闉是门外之城，即今之门外曲城是也。”闉或曲城应该就是瓮城一类的设施[15]。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不断涌现，商代的较为成熟的瓮城实例最先在山西垣曲商城得到了初步确认（图五）[16]。

发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垣曲商城始建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下层，延续使用到二里岗上层时期，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年代大体相当。垣曲商城的西城门门口北端墙体西折约 20 米后变窄并向南延伸至城墙西南角，形成与西墙平行的外围第二道城墙，并与西墙形成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五 垣曲商城平面图(改绘自《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

狭窄走廊,将西城门完全遮蔽,形成狭长的封闭空间,构成瓮城[17]。垣曲商城的瓮城与汉代乌力吉高勒城障瓮城的形制相类,均由城墙和与之平行的窄墙并行构成,唯门向不同。2010年发现的二里岗时期的河南新郑望京楼城址东一城门,平面呈"凹"字形,由城墙、外护坡、门墙、门道、内护坡、道路及附属建筑组成[18]。望京楼城门亦被认为是具有瓮城某些特征的早商城门,虽然其瓮城曲向有别于垣曲商城,但显然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及所谓晚期瓮城的某些特征[19],更类似晚期的内瓮城。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在山西陶寺大城北城墙发现了具备瓮城特征的城门,因此瓮城出现的时间可以早至龙山文化中期[20]。但据发掘者介绍,在陶寺大城北城墙发现的瓮城类设施位于Q2中段,类似城门处墙体向外折出,形成将门道遮蔽的独立空间。

综上所述,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瓮城的形成时间先后由唐宋、汉代(包括高句丽时期)上溯至商代乃至龙山文化晚期。尽管在陶寺大城发现了疑似瓮城类的设施,但其形制并不规整,尚难有明确的结论。石峁遗址瓮城首次明确地将瓮城出现的时间上溯至龙山文化晚期。

三 石峁遗址瓮城与早期城防设施的滥觞

石峁遗址瓮城的保存情况较好,但其形制及结构显然不是处于萌芽时期。下面根据早期大型建筑中某些类似后世瓮城结构的设施对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外瓮城的产生或许与早期大型宫室正门附属建筑或城池中的影壁有关。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四期(仰韶文化晚期)F901主室正门外侧有门篷,门篷两侧有16~20厘米厚的草泥土墙,在墙内发现了支撑门篷顶盖的直壁柱洞[21]。门篷构建于主室外侧,不仅具有遮蔽正门的作用,而且阻碍了外来者长驱直入宫室内部,与后世瓮城的功能无异。在郑州西山仰韶文化环壕城址北门外侧正中横筑了一道长约7、宽约1.5米的护门墙[22],这道护门墙与主体墙体及城台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完全封闭的空间,起到了遮蔽门庭、延缓入城的作用,其防御功能显而易见,与后世瓮城的作用相似。龙山文化新密古城寨城址廊庑基址F4的1号和2号门由多道夯土墙形成曲向结构[23],与主体宫殿建筑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空间,亦可以延缓外来者进入宫室内部的时间,具有后世瓮城的功能。西周时期的周原遗址凤雏宫室基址大门之外的影壁[24],形制规整,高大巍峨,显然较郑州西山城址的护门墙更为成熟,具有防御的功能。

遗憾的是,目前尚无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石峁遗址瓮城的形成受到了早期宫室之外修建的门篷或影壁类设施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石峁遗址瓮城是这一区域性中心聚落的统治者面对外来压力而追求自身生存环境安全的结果,形成如此完备的结构当是受到了早期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同类设施的启发。

河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的石城址，无论文化属性还是筑城传统都有密切的时空关系。在河套地区仰韶、龙山时期的考古发现中，石城聚落的城门之外一般修建类似瓮城的设施。内蒙古准格尔寨子塔古城西北门的内外寨门之间由两道东西向的内外石墙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空间[25]，内墙、外墙上各有一处城门。外墙城门向外各有垂直于寨墙的数道短墙，形成相对独立的空间[26]，起到了外瓮城的作用；而其内墙上石墙交错形成的寨门以及内外墙之间形成的封闭空间，与石峁遗址东门址曲尺形结构的内瓮城相似。寨子塔城址的石砌城墙、寨门及其附属设施属于阿善文化范畴，年代为距今 5000~4500 年。考虑到地域因素及时代差异，在内蒙古中南部及陕西榆林地区石城大量涌现的龙山时代，石峁遗址的形态成熟的瓮城与之当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从早期瓮城多见于北方地区的情况看，抵御外来入侵，加强聚落防御能力是这类设施最初的功能。至于石峁遗址瓮城是否对后世瓮城特别是中原地区都邑类城址中的瓮城有直接的影响，尚需更多的考古资料来证实。

上述早期瓮城的实例多为修建于城址大门之外的外瓮城，考古发掘所见内瓮城的实例则晚于外瓮城，寨子塔城址的内寨门及其内外墙之间的空间或许是内瓮城滥觞的重要证据之一。但真正意义上的内瓮城，除了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的内瓮城外，就是明代南京城墙，其做法是将瓮城建于城门内侧，其门外不置瓮城。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瓮城的滥觞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从早期大型宫室外的门篷、影壁，到形成半闭合或不闭合的门外围墙，再到石峁遗址的相对成熟的外瓮城和内瓮城，其发展序列有迹可循，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早期具有瓮城功能的设施对石峁瓮城的形成产生过直接影响或它们之间在形制上存在承袭演化关系。先秦时期瓮城的滥觞是多元的，类似的社会环境、生存压力及聚落群之间日趋强烈的竞争关系促生的对防御功能的需求均会导致形态趋近的城防设施，马面如此，瓮城亦不例外。需要说明的是，从瓮城萌芽、发展的过程看，北方地区史前及先秦时期的考古发现对其渊源的探讨似应更多关注。

目前尚未发现夏代的瓮城，但偃师商城[27]、垣曲商城[28]、临淄城[29]、郑韩故城[30]等有瓮城。汉魏时期，瓮城制度逐渐完善。唐宋时期瓮城已经成为大多数都城及大型城址的必备城防设施，形制更加规范，双瓮城逐渐形成制度。唐宋时期的城门采用双瓮城形制，反映出城市防御系统的完善和进步，也为之后的多重瓮城结构的流行开创了先河。明清时期双瓮城制度继续流行。总之，中国古代城门的营造与布局，与中国古代军事发展的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冷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城门作为城市军事防御的要塞，设置瓮城的必要性大大降低。随着大型城址中城垣建设的落寞，瓮城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销声匿迹。

---

[1] 王炜林等《2012 年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2 年 12 月 21 日。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 年第 7 期。

[3] 测年工作得到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资助（编号 2013BAK08B01），数据由北京大学吴小红提供。

[4] 邵安定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壁画制作材料及工艺研究》，《考古》2015 年第 6 期。

[5] 纪仲庆《扬州古城址变迁初探》，《文物》1979 年第 9 期。

[6] 扬州城考古队《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 年第 1 期。

[7] 单庆麟《渤海旧京城址调查》，《文物》1960 年第 6 期。

[8] 阎文儒《吐鲁番的高昌故城》，《文物》1962 年第 7、8 期合刊。

[9]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 年第 1 期。

[10] 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

[11] 李振翼《八角城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 6 期。南城门瓮城的面积约为 15.3 米×10 米。

[12] 城门缺口外面的另一道长方形小围墙，围墙南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北长14、东西长20.5米，东墙北端有一宽约2米的缺口，可供出入。在城的四角还筑有向外突出的类似后代的“马面”。

[13] 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

[14] 郑元喆《高句丽山城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15]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197~198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6]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17] 董琦《瓮城溯源——垣曲商城遗址研究之一》，《文物季刊》1994年第4期。

[18]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城址东一城门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9期。

[19] 顾万发《论新郑望京楼商城东一城门》，《中原文物》2013年第4期。

[20] 同[19]。

[21]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

[22]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2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4]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

[2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寨子塔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6] 发掘者认为此处数道短墙似为顶撑寨门和石墙之用。笔者以为这种短墙与大门的防御有关，由于前端被破坏，是否有横向短墙封闭已不详。

[27] 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都邑制度研究》，《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28] 同[16]。

[29] 曲英杰《齐国故都临淄》，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

[30] 韩品铮、杨国庆《中国古代瓮城初探——兼论新郑故城城门内建筑遗址与南京的内瓮城》，《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五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王　霞）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